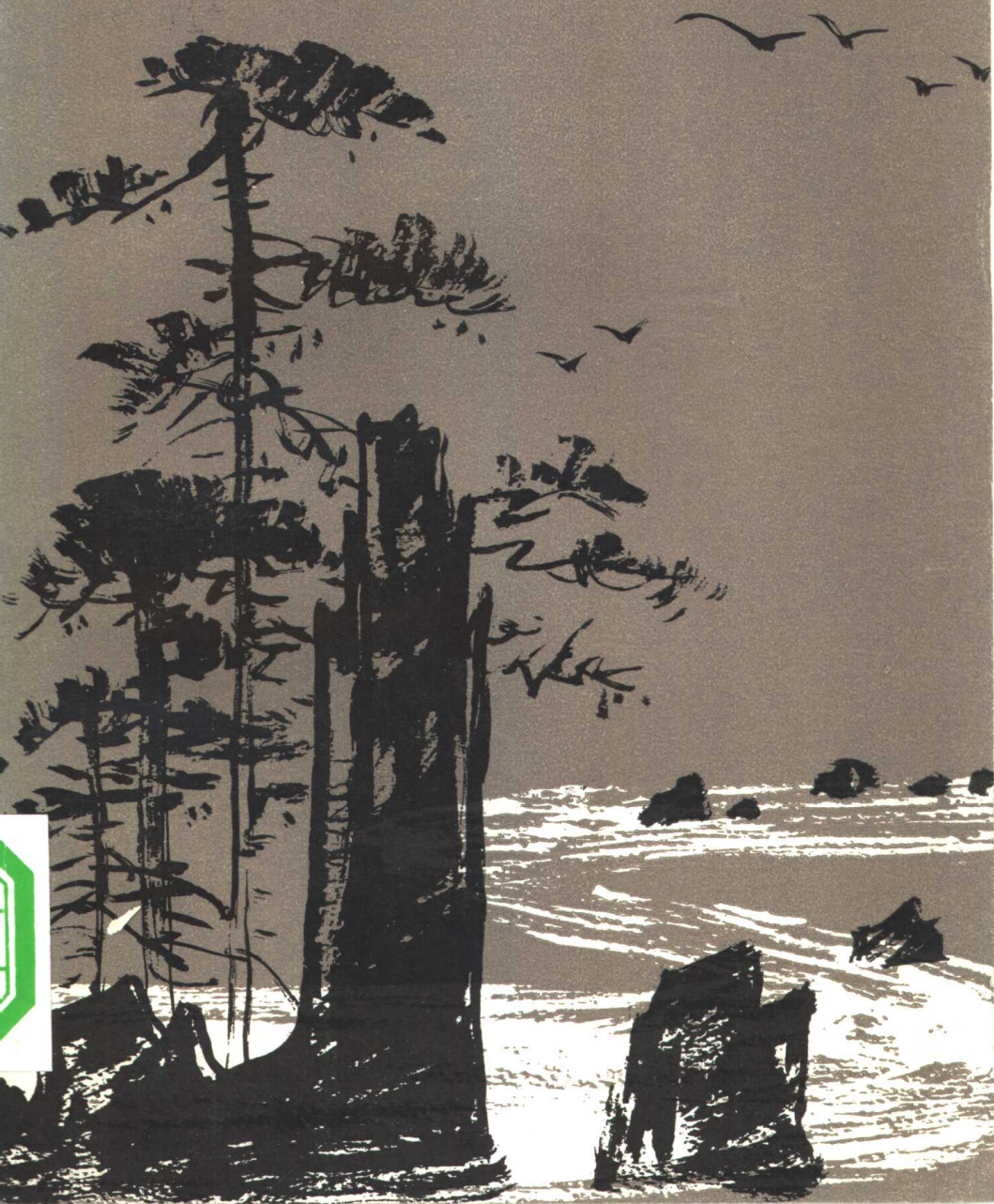


骆宾基短篇小说选





2 035 9055 0

骆宾基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骆宾基短篇小说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5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插页 2

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0

书号 10019·2961

定价 1.15 元

我的创作历程(代序)

——为了悼念雪峰、荃麟和彭康等同志

一

一九四九年初冬，我陪着重聚不到半年的母亲，从北京来到山东省济南，我父母家乡的首府。解放后的欢乐，北京饭店一个晚会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辉煌感以及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大会师所给予的欢欣和鼓舞，都已经是属于“距离遥远”的历史性的记忆了。

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所积累的社会生活(写作素材)，已经黯然无光了，失掉它在我心目中原有的光泽了；而伟大的共产党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闪着史诗般光彩的革命斗争生活，我又没有切身的体会。尤其是两年之久的监狱生活，几乎是使我与世隔绝了。如果写出来，在当时只能是属于旧的批判现实主义范围内的“暴露文学”，仿佛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政治意义。(自然，这种认识，现在看来也是有片面性的——题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思想力的艺术表现。)而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价值，本应在于它的思想影响——政治效果。我突然发现自己已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文学工作者了。

尤其是一再学习着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旧的艺术标准，例如资产阶级的“人类之爱”一类的东西，在我的头脑里，似乎已经崩溃了；而新的艺术观，还没有形成。我怎么来写呢？用什么来为祖国和它的优秀的儿女们服务呢？我感到“灵魂深处”从来没有的空虚。

我在团聚不到半年的母亲面前沉默不语，仿佛旷野中一个彷徨的旅客，不知道哪里是通向解除饥渴的村镇。

“你老是想什么呢？”

我顿然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说：“没想什么。”于是又在灯下翻阅属于过去年代的《大众日报》、抗战时期的《胶东大众》，并摘录着值得研究的材料。我突然对章邱县旧军孟家的土改记载，感到兴趣。在胶东广大的农村里，世世代代相传着关于“九斤孟家”的已是五百多年前的古老神话。“旧军”变成了“九斤”，这是北京瑞蚨祥绸缎庄的祖籍，它和分布在津、沪、汉各地的八大祥字绸缎庄都是属于一个大地主祖系。因之，章邱县旧军镇的土改，是有典型意义的。我必须到“旧军”去生活、体验、观察和研究，着手积累素材。而以后，我也果然如愿以偿。在这里怎么能使我忘记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呢？这不是党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人吗？我去旧军镇生活了一个短时期，也访问了一些人物，但都是些与北京瑞蚨祥之类的祥字号有关的受半封建式的商业主所剥削所损伤过的人物。我也看过孟家地主的大宅院，在一个二楼的大厅式的房间里，只各式各样鸟笼就占据了整个一间大厅，别无它物。自然，当时各个笼子都是空的，可以想象到土改以前，有多少勤劳的农村青年，就为饲养地主的声色娱乐物而失去了他们宝贵的

青春。自然，这里有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但总牵连到民族工商业的背景，这就需要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量是很大的。而且我的笔应表现新兴的贫雇农阶级在党的培育下，在土改当中所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尽管这里天地很广阔，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和社会生活的《红楼梦》，但我不能写，这不是我的这支笔力所企图创建的楼阁，我需要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生事物占压倒优势的生活领域。我再次阅读《讲话》，对到生活中去，也有了新的理解。战争、土改，既然已经是过去年代的斗争生活了，那么，我既然不写历史小说，就必须从一些“历史”材料中解脱出来，从当前展开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新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属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源泉。

因之，从章邱回来之后，我仍然如“茫茫旷野之间”的旅人。哪里是解除我的饥渴，恢复我的文学生涯之路呢？

我在这里不能不再次提到彭康同志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显然，他对于一个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刚刚进入解放区所有的旧的艺术观已经破碎、新的艺术观又没有形成的“苦闷”，是有着深切的理解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三十年代从上海创造社走向苏区革命战场上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他又一次在我遵循毛主席在《讲话》中所指定的方向摸索前进的时候，加以引导，要我到鲁中南的导沭整沂的水利建设工地去看看。于是我轻装走向淮海地区。在路过徐州的时候，我又绕路看了看当年震动世界的淮海战役的战场。感谢徐州市委并秘书长给予的热情的支持，我们很快地到达了曾经作为杜聿明的司令部所在地的陈官庄。这是一个平原地区上的村庄，泥壁草屋。有的是砖壁，但同样是新的草顶。距离淮海大

战已经将近一年了，沿鲁河两岸还有未及平整的战壕。而家家户户新的草屋顶，也说明当年的毁坏程度。尤其使我惊奇的是：所有的农户都没有房门，家家都是挂着草帘来挡风。门板呢，先是拆下来作了国民党匪军战壕上的防护板，以后又从防护土层底下扒出来当柴烧了。为了冬季取暖，最后连房顶上的草和瓦底下的屋梁也拆下来了。三十万机械化匪军麇集在一二十里范围之内，野营露宿，被围困的狼狈而混乱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了。陈官庄村东北的小麦地，当时是一个空投粮食的广场。这里既是匪七十军、七十二军之类军部机枪连为了争夺空投物资的“警卫阵地”；同时又是各军官兵与随军逃亡的县区两级官吏以及地主豪绅之类人物，互相作买卖的交易市场。不用说银洋和美钞，是主要的通用货币，而官兵也各有抢劫来的物资在这里廉价出售。将近一年，这一带的农民，还依靠从田野捡集子弹壳到收购站去论斤过秤，作为碎铜卖，这也是家庭副业收入的来源之一。有时在碎铜片里还发现金条或金块。更不用说，沿公路两旁的村庄，从徐州到淮海战场地区，几乎村村都有当时拾来的军用物资了。军用大卡车轮子，都给会手艺的农民卸下来，改作大车轮子卖掉了，而整个整个的汽油桶，就凿个眼儿让汽油流掉，以便滚着空桶回村去。

总之，这又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一片珍贵的矿藏，这也是我的笔力很难开凿的矿区。因为作者必须熟悉部队战斗生活，这是塑造解放军指战员形象的基础，还必须研究大量的有关淮海战役的资料，包括各参战部队的纵队司令部的军事会议记录、侦察报告之类的档案。在我，仍然是很难担负这样一部雄伟的连列夫·托尔斯泰都难以想象的史诗般的著述任务

的。即便是党给以支持，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我还必须走访参加这一伟大战役的各级指挥员、若干英雄连队的模范人物、有名的人民功臣。这样浩大的工程，自然比起写土改前后的章邱孟家那种半封建的工商业者的地主家族的崩毁更有意义。因为这是以我们的英雄的解放军中涌现出来的新型指战员为主体的。自然，如果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构方法，把山东章邱孟家的地主庄园，搬到徐州地区陈官庄附近，那么两者的主题可以汇集到一起，使新旧两个时代的色彩更明显，相互衬托，这样，自然它将不是属于旧的批判现实主义范围的作品了，而是闪烁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光彩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了。

我是多么向往着这个雄伟而又瑰丽多彩的矿藏呀！正如面对着几十吨重的一大块彩色斑斓的宝石矿一样，我只能一再赞叹着，围绕着它转来转去。搬，搬不动；捐，又捐不起。我相信或在当代，或在百年之后，必有奇才，把这个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有名的大师们所难以想象的雄伟而瑰丽无比的淮海战役的矿藏，雕制成巨器，搬到文学艺术领域里来。这必将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领域里的高峰之一。它已遥远地耸立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敢于不怕付出一、二十年的代价去攀登。沈老雁冰先生说：“盛世出奇才”，我坚信后来人必胜于过去的前一代。

二

我终于背着行囊独自来到沂蒙山南的导沭整沂的水利建

设工地。

沐河要在这里拦腰截断，不让它继续南流——流向几千来的古道，它每到山洪期，年年在苏北为灾。在这里，要用人工开一条十七华里长的引河，把它引向东方入海，解除苏北五百万亩土地的灾害。

沐河东西的人工引河两岸，民工如蚁，各自在自己的工段上忙碌着。一眼看去，一道宽有半里路的蓝色和黄黑两色混杂的人流，都在动荡着，汹涌着。这半里宽的人工引河，已经揭开了地面的冻土层，到处是欢快的笑容，兴奋的眼光，到处洋溢着在竞赛中所有的挑逗性的呼喊：

“日照县的还想夺红旗么？”

“怎么？那杆红旗还是铁水铸在你们费县工段上了么？”

在这里汇集了来自鲁中南地区各县十万有零的民工，都奋力要夺取这杆红旗，哪怕是在本县的工段上插一天，也算是一种为人称羨的荣誉。

再说引河两岸，各自根据本县本区划分的工段，都建立了各自的半地窖式的住宿工棚，矮小的纸窗都紧贴着地面，芦苇席搭的棚顶上都涂着泥。原来就分辨不出本区这一小队和那一小队的住宿地，如果矮棚顶上不插着各色彩旗或门顶上有根绳子盘的五角星或苇笠作标志，简直就找不到哪里是自己的住宿窝棚。

进门就是土台阶，到了底下，两边满是谷草或豆秸铺的草铺。各自的铺盖都卷着，矮墙上挂着蓑衣、羊皮袄、成捆的黄烟或是步枪，有的还带来了装着鹌鹑的布口袋笼子。外头，各区有各区的大炉灶，炊事人员兼着宿卫，各自奔忙不息。所有

大锅、菜板、面案、水缸、刀、勺等炊具，都是各区的炊事人员装在独轮小车上随着本村的民工队，行经几十里或一二百里的路程运来的。而工地指挥部所属粮库，供给成麻袋的小米，菜站有成坛的酱豆腐和咸菜。领粮的民工小队长在排号等待过磅，人们麇集在山般的粮食垛底下，抽烟闲谈，不禁议论起来了：

“我说，国家年年要公粮，原来都运到这里来，供应我们挖河工吃了！十多万人，一天一人两三斤，就得二三十万斤的消耗呀！要不是咱们这个国家，谁动得起这样大的工程呀！”

有的说：“还有工厂呢？部队呢？国家要供应的粮食可多啦！”

“你参加过淮海战役么？”

“抬担架去了！”

“你没看见咱们华东三野九纵的大粮站么？都堆在屋子里，外头就用草席和木柴遮掩着，防空呀！可不象现在这样，这才叫和平环境呢！”说话的人，是个宽肩厚背的庄稼汉，却抽着一个大头烟斗，蓬蓬勃勃的络腮胡子围绕中露着两只如丛草中两座泉水般的眼睛。我未及细听，就随指挥总部宣传科的人，走向一个民房，在那里搁下我的行囊，房东日夜忙碌着烙麦面锅饼。原来这里是五天一个集日，集市就在引河的北岸，如今由于引河一开，那个集市就向北迁移十里。这些锅饼是为了供应民工们的，房东的家属就挎着篮子在休工时到各工段沿岸去叫卖，外带着纸烟、火柴，全家忙得象节日一般欢快。

我选择的工段自然是竖着大红旗的费县工段，我穿过莒南县、沂水县和平邑县的各个工段。而费县的工段，要比邻区

深下去约一两尺，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宽阔的地窖，两岸都已经搭起了桥板，运土工来往如梭，在桥上健步走着，担子在肩上颤动着，前后成行的挑土工和抬土工简直形成一个脚步，构成一个有节奏的快步的旋律，仿佛有乐器伴奏着一样，不怪人们快步如舞似的闪着欢快的笑容了。以致有许多其它工段的指挥人员前来赞赏般的参观，看的入了迷。尽管这些属于沂蒙山区的民工们，穿戴都还很破烂，但眼睛里都闪着一种兴奋的光泽，露着在集体劳动中竞赛式的欢快笑容。他们的欢快，实质上还来自解脱了日本法西斯匪军和国民党匪徒所加在他们颈项上的无形的枷锁。几千年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封建统治势力彻底土崩瓦解了，而他们在土改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欢快实际是来自这种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来自战后的幸福生活。而今天，十万民工人人都想夺取的大红旗又插在他们的工段上，真如铁水铸在土墩上一样，他们还想提前完工，把这杆红旗带回自己的县里去，哪能不欢欣鼓舞呢？我立刻为这欢快的海洋般人流所感染，中国如散沙的旧时代，确确实实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了。今天，我们祖国沂蒙山区的农民，不但组织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水利建设，而且是组织得这么好，这么有节奏的如有音乐伴奏般的快步如舞的劳动，又是我以前所难想象的。在人群中有一个彪形大汉，身穿一件黑布短大衣，有着两颗铜铃般的大眼睛，乌黑发亮，围绕着他的各村的民兵连长或村长，或掂着扁担，或提着锨，都欢快地洋溢着笑容，听着他说什么。

“是谁呀？”我小声问：“这个大个子！”

“他，你还不认识？沂蒙山区有名的武工队长呀！”原来，

这个彪形大汉就是我早在莒南县十字小店里住宿时已听人说起的一个传奇式英雄人物，当时他是费县水利科的科长，是本工段的一个指挥。

“客观情况变了，咱们的劳动组织也得随着变呀！”他说：“土地下出现砂礓石了！咱们两把大镐配五把铁锨的药方不灵了！地质变了，咱们也得跟着变，五把大镐得配搭两把锨，每小队得抽出三根扁担来，去抡大镐；咱们沂蒙山区武工队出身的老伙计们，可不能给砂礓石绊住脚，大红旗不能给莒南县夺了去！你们说，还能让它请一天假到莒南县去住一天亲戚么？”

“不能！”

“好！咱们可要把吃奶的劲拿出来呀！怎么样？”

“咱们变！”

于是劳动组织很快的作了调整，费县的运土工又是来往如梭在两岸搭的桥板上川流不息地流动着，正如那个工段指挥所说的“日行千里，不出磨道！”自然，这是一个为我注目的干部，以后我不止一次跟随他到住宿的工棚里去，听到许多关于他所率领的武工队的活动。在他那铜铃般的大眼中闪着鹰似的锐敏的眼光，笑声爽朗，谈吐坦率。别人说他“杀人如宰鸡”，他却说：“什么人呀？恶霸地主和伪军头目嘛！不是人！”于是讲起到敌占区赶集，为了执行人民政权已判决某人死刑的任务。那人是个作恶多端的伪地方保安团团长，而且就是那个敌占区集市小镇上的大地主。连续赶过三次集，才碰上这个又矮又胖的伪军团长走出他的有卫队守护的深宅大院。他当时带着两个随从马弁巡视市集。当他的两个随从兵在赶

集的人丛中为我们的化装武工队员所隔离、拦阻而发生争执的时候，那个伪保安团长还颓然地四顾，茫然不解背后争吵是由何而起的一瞬间，就被迎面走来的彪形大汉一手掐住脖子按倒在地下了，不待挣扎，枪就响了。为了防止流弹伤人，枪口是直对这个恶霸地主的脑后向下打的。并且很快由武工队的宣传干事当场读了人民政府的判决书。谁也未及注意这个彪形大汉耳朵上溅的血斑如花，等到集市的人群四散奔逃，伪军出动追击的时候，这个有着铜铃般大眼闪着锐敏眼光的雇农，已经在一里外骑着自行车和化了装的武工队员谈笑风生地赶回根据地，准备向抗日民主政府汇报去了。

所有这些见闻，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后在油灯下都作了札记。每个民工几乎都有各自传奇式的经历，或是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或是碾庄战役的担架人。每当晚上，一天劳动评工总结之后，在低矮的半地窖式工棚的草铺上，短笛悠扬，尽是一些回顾战争年代的闲话，而那个沂蒙山区的老武工队长，总是不愿多谈自己，闪着谦虚的笑容，给你让出坐的地方，而他关心的却是工程进度，每人平均的“土方”。总之，是以一个工段指挥的身份，在思考问题，正如我所习见的一般县区级的自知在周围有着威信的领导一样，很不愿意过于显示自己。因而，这个人物，在我手里尽管有了一些传奇式的故事记录，但却仍然是一个概念式的人物。

不久，我在引河南岸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次不是关于调动劳动力，随时改变劳动组织以与地质变化相适应的工作方法，或过去的传奇式的英雄事迹吸引了我，而是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吸引了我，关于他我还任什么都不知道，但我却发现

原来这是我“熟悉”的一个人物，尽管我们并不认识。

这人每天都蹲在岸上一棵矮小的树底下，背依着冬日枝柯光秃的树干，口含着一根短烟管，任什么也不做，沉默地独身蹲在那里，竖着两膝，旁若无人一般，想着什么愁人的心事。他的脸上满是从过去战争年代的灾难生活所留下的遗迹，皱纹又深又密，面颊瘦削，胡须蓬硬如刺猬的针，显然是个生性倔强而粗暴的老人。眼光带着一种深沉的阴郁，和他所观望着的那些闪耀着竞赛式的劳动中所有的兴奋和欢快的气氛，完全不协调。实际上，仿佛他任什么外界景象都没有看见似的，尽是渺茫的向前望着而已。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呢？这不正是我所熟悉的过去的中国农民么？这不正是普希金，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常常出现的那种属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的农民形象么？我立刻在他身旁坐下来。

“老大爷，你是本地人么？”

“噢！”

“是后面这个村子的吧？”

“噢！”

“你的地全都挖掉了么？”

“挖掉了！”

“民运科没来登记么？挖掉的地都会折价赔偿，而且村里也会给你安排工作。你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民工队？以后还会调到国营农场去！”

“你说什么？”他说：“我耳聋，听不见呀！”又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辈子啦，我到农场去干什么呀？”

他站起来，背着一个空粪筐走掉了！临走时，还在鞋底上

敲敲烟锅，插到腰带上，仍然仿佛独自一人似的。同时，我也随他站起来，但他毫无感觉一般，径自走去！自然我是轻易不肯放弃这一发现的。以后，我从他的邻居口中，终于知道了他内心忧郁的来由。原来他是一个孤老，他的年轻的独生女儿，早已出嫁，就在引河北面的邻村，两村相隔也不过二、三里路。每逢集日，老汉必定和自己的独生女儿，还有两个小外孙见面。女婿在战争年代已死去，因而父女是相依为命的度过了日寇和国民党匪军先后焚掠的灾难年代。土改后，这个老汉刚刚分到四亩有轱辘井可以浇灌的菜园地，而女儿那里也分到了土地和一头毛驴，幸福的日子刚刚来到身边，却不想两个村子之间开了这么一条从古以来作梦也难想象的引河。如今把他和守寡的年轻女儿家住的村庄分成了两个地区，集市也往北挪了。就是将来建桥，也必然在十里之外的两个公路口之间，要想过河去看看两个小外孙，绕着桥一来一往就是二十里路。往年有个什么急事，闺女捎个口信来，当夜吃过晚饭自己就去了，月亮没落又赶回来了。如今呢？引河没挖成，还能绕着工段走，一上一下多爬两个河崖不说，引河一竣工，放过水来，自己有个病灾什么的，找谁绕二十里路去捎口信呀？

这个孤独的属于农业个体经济的旧式老农民，正是我的艺术观所需要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的模特儿。他的命运和内心世界，为我提供了幻想奔驰的旷野，我直到第一期工程结束，还久久地在构思着，遐想着，但始终提不起笔来。因为毛主席的《讲话》在我的文学艺术的创造领域里闪烁着光辉，这个在我构思中的主题，岂不正是属于“人性论”之类的东西么？这种孤独与渺茫的感情，由于父女之间的关系为客观世界的变

化所隔断而来的东西，不正是代表着走向穷途末路的旧式农业个体经济的灭亡么？岂不正是说明我要为这个旧的人物唱挽歌，我的艺术观岂不是原封不动地仍然站在十九世纪世界文学所建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么？如果这样自然主义地来写真实，那么这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哪里呢？它的价值不是需要依据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效果来衡量么？十万民工欢欣鼓舞所开辟出来的十七华里引河岂不成了破坏“人伦之爱”的工程！关系到苏北五百万亩农作物的收成，关系到千万农民幸福和温饱的社会主义的水利建设，岂不成了使人伤感的不幸的设施！

是的，翻阅着自己的字迹潦草的札记，看来看去，都是一些关于劳动组织的变化，工作方式的改进，等等。除了劳动方法上的记录，自然还有很多生动迷人的关于战争年代的各式各样的英雄事迹，但却只是一些故事，而人物却是平面的。原来那些人物在我内心深处并没有产生艺术性的感情，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去。

我开始发现，尽管在学习《讲话》时，在理论上认识了旧有的艺术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认识了所谓“人道主义”之类脱离阶级性的若干观念，是与无产阶级的艺术要求不符的，而且自认为已经全部领会了《讲话》的精神，但在实质上，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名著所久经陶冶的艺术观，并没有由于理性上的认识而崩溃，灵魂深处仍然有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王国。

从导沭整沂的工地上归来之后，久经思索，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就对《讲话》又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领会。但这也仍然限于对那些“人性论”以及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之类

的艺术观方面的问题，还认识不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含义；相反的，却认为自己的立足点，早在十三年前，开始由哈尔滨逃亡到上海，从事文艺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移过来”了。尤其是一九三七年冬，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王任叔同志已经介绍我到浙东去，并得到《呐喊》的主编人茅盾先生的资助；而且就要离开上海的前夕，在鲁迅先生的寓所又听到那位从瓦窑堡受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遣到上海来的党的工作者冯雪峰同志对我指出：“东方巨人在西北，民族希望在西北，我们在东南只能作些宣传工作，动员全民抗战就是了”，更以为方向明确了。于是在浙东期间，写了《千人塔下的声音》，在桂林写了《老女仆》，《乡亲——康天刚》以及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发表了《由于爱》等短篇，反映着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爱与憎，以及剥削者的幸福建立在劳动者的不幸的基础上的客观事实，并据此自认为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领域里的文艺战士，哪里还会存在着世界观的改造问题？更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是属于“理智属于未来，感情属于过去”的知识分子之一，更不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尽管在文艺战线上，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效果，但基本上仍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围内的作品，它们与旧批判现实主义不同的，只是时代的背景和人物政治面貌的变化。在艺术观方面，却仍然原封未动，仍然是带有“暴露文学”的阴暗色彩，而在主题思想上仍然呈现着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阴影，以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色调。